

十多年来收集一千多件抗战老物件 山东小伙“打捞”抗战记忆

在德州齐河县的李英屯村，一间290多平米的平房内，38岁的村民冯红雨将收集到的一千多件抗日战争老物件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每件物品前，都有他一笔一画写下的展示牌。8月27日，记者在齐河见到冯红雨时，他正细致地擦拭着展柜。对他而言，这不仅是一种爱好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



文/片 记者 胡玲玲 郭辰昊
见习记者 王浩 德州报道

让历史被更多人看见

在北京工作的冯红雨，时常乘坐高铁往返于北京与山东之间。北京有他的家庭与工作，而在老家齐河，则有他始终放不下的牵挂。

过去十多年间，冯红雨收集了一千多件与抗日战争相关的老物件。2020年，他特意在村里租了一间屋子，用来陈列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忆。

冯红雨的收藏中，既有见证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物品，也有记录日寇侵华罪行的物证，包括抗战时期发布的抗日告示，抗日队伍使用过的红缨枪，日寇侵占齐河县后建立野战医院的原版照片，以及日军使用过的军服、军靴和钢盔等。

“这是一张记录日军侵华历史的老照片。画面中，一排头戴防毒面具、全副武装的日军士兵，正在向我军阵地射击。”冯红雨轻轻摩挲着不久前从日本拍卖网站购得的一系列照片，语气凝重，“结合日军当年发布的战报，这是他们曾在战场上使用过化学武器的铁证。”

这些影像，大多来自日本二手交易平台，是冯红雨从海外一点点“追”回来的，单张花费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。尽管不懂日语，他仍紧盯多个海外交易平台，发现与侵华战争相关的重要物件，便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委托懂日语的朋友，自费购回，“有可能看到一个有意义的东西，花一个月的工资买不了，那我再等两个月、三个月，总有机会攒够钱去买。”

在与收藏圈朋友们的交流中，冯红雨对抗日战争历史的认识也逐渐系统化。“有些照片虽然没有标注具体拍摄时间，但可以通过日军的军装、装备来推断背景。”冯红雨指着一张照片解释，“比如这张日本军官站在济南千佛山拱门建筑前面的照片，从服装判断属于陆军，拍摄于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，日军在那年年底占领济南。而在1928年，日寇曾以海军陆战队形式入侵济南，穿戴有明显不同。”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对冯红雨而言，打捞抗战记忆的事，不仅仅是一种爱好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

“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在试图否认和抹杀侵华历史，他们也在回购这些实物，目的往往是销毁或封存，以阻止真相传播。越是受到关注的物件，就越可能遭到他们的阻挠与高价截留。”冯红雨说道，还有一些老物件散落在民间，其中有些残破不堪，有的纸张已经发黄、掉渣，如果不抓紧时间“抢救”，它们很可能就在无人知晓中隐入历史尘烟。

“而我现在的心愿，就是把这些年收集的抗战实物和照片系统整理出来，按照日本侵华的时间线索，编制成册。”在冯红雨看来，这段记忆不仅属于齐河，也属于山东乃至全国，应当被更多人看见、记住、传递下去。

收藏“不计成本”

冯红雨是如何走上收藏之路的？他为什么对与抗战有关的老物件情有独钟？

“收集老物件是我一直以来的爱好。”冯红雨回忆，他从高中时期就踏上收藏之路，起初只是收集入门级的钱币和邮票，后来转向承载着历史文化的其他实物，多以照片为主。10年前，看完阅兵仪式的直播后，冯红雨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，随后便萌生出一个念头，要更系统地收集与抗战有关的物件。

这份迫切，让冯红雨做出不少“不计成本”的决定。除了跑遍齐河县的各个村庄和山东各地市，他还远赴哈尔滨、长沙、洛阳等地，累计支出达一百多万元。

家人非常理解冯红雨的选择，为了让他不要有太大压力，妻子宽慰他，“等退休之后，你都不愁没事做，光是给孩子们讲讲这些老故事，就能把时间填满。”

朋友宁先生感慨道，“冯红雨付出的要比得到的多得多，常常为了一件藏品开车几小时，哪怕最终空手而归。”同为收藏爱好者的宁先生希望，人们能够铭记家乡曾经经历过的苦难。

冯红雨努力收集抗战记忆，正是为了让一些几近湮没于历史中的人和事不被遗忘。冯红雨的同族叔叔冯兆恩是一位革命烈士，1942年参加革命，曾担任地下交通站联络员，于1943年被敌人杀害，年仅26岁。当时为了保护烈士的家人，有关他的记录极为稀少，甚至连族谱中也一度未有记载。而现在，他的故事慢慢被人们所知。

付出的努力渐渐有了更多回应。附近有村民被冯红雨的执着所打动，主动将收藏的中国军队在齐河缴获的日军水壶和望远镜赠给冯红雨。还有村民在冯红雨依据当地县志整理的齐河抗日英雄名录中，看到自己爷爷的名字，热泪盈眶。

这样的时刻，是冯红雨能够坚持下来的动力，他说，“我们都是特定历史时间段老物件的临时保管者，每当我把这些收藏和历史讲给大家听，就觉得特别欣慰。如果不去做，心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，有很多放不下的东西。”



记者 李静 徐宁 济南报道

寻找姥爷李文修，是姥姥的夙愿，也是周红红一家三代人的心愿。这一心愿从李文修离开时的1936年算起，时间已经持续了近90年。

李文修是河北人，15岁投身革命，21岁被捕后便与家中失去了联络。据传，李文修可能曾被关押于济南新华院。凭借这一线索，周红红带着一家人的嘱托，联系到本报果然寻亲栏目，希望在相关部门帮助下共同解开姥爷去向之谜。

跨越四代寻亲

周红红从未见过姥爷李文修，家里那张《革命烈士证明书》是仅有的关于李文修的痕迹，上面写着：“李文修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，经批准为革命烈士，特发此证，以资褒扬。”

在一本《泊头红色记忆》中，收录着他的生平。李文修，河北省泊头市西辛店乡梁店村人，出生于1923年。15岁参加革命，18岁担任献安县第五区区委书记，后调任献安县第九区区委书记。1943年6月被捕，誓死不屈，之后被秘密杀害，年仅21岁。

但是，关于姥爷被杀害的说法，周红红的姥姥不认。“姥姥始终觉得姥爷还活着，早晚有一天会回来。他们都说姥爷牺牲了，但是没人见到，更不知道埋在哪里。”

新中国建立以后，李文修被迫认为烈士。抚恤金一直在县民政局放着，姥姥不肯去领。她一辈子没改嫁，为老人送终，把孩子拉扯大，再苦再难的日子都咬着牙熬过去，却唯独不愿承认姥爷没了。

直到妈妈长大成人，县民政局联系到她，家里才第一次领取了抚恤金，共一百八十元钱。妈妈没敢告诉姥姥，怕她伤心难过。

等待丈夫回家，成了姥姥一辈子的惦念。姥姥珍藏着自己的嫁衣，每年都拿出来晾晒。她跟周红红二姐交待过，“我走的时候，一定给我穿上嫁衣。到了那边，怕他认不出我来。”姥姥病重弥留之际，一直等到二姐从外地赶回来。“姥姥嘱咐一定要戴上她结婚时的银耳坠，穿上嫁衣。”二姐依言照做后，姥姥这才安详地闭上了眼睛。

最后的记忆

关于姥爷李文修被捕前后的经历，姥姥多年前曾经讲述过，这也成为这个家多年来不愿触碰的伤疤。

1936年6月，李文修被捕时，妻子正怀着他唯一的孩子，也就是周红红的妈妈。

当时，李文修和战友们从张铁房村

转移到油瓶村。第二天下午1点多，因叛徒出卖，他们的行踪暴露，李文修和战友紧急藏到地窖。

鬼子小队队长带领二三十个伪军在街上鸣枪搜查，气急败坏之下将房东大娘绑了起来，并扬言：再不出来就把老人给杀了。

李文修几人便站了出来，随后他和战友申瑞清等人被押到富庄驿据点。敌人劝降、拷打都不起作用，六天后，李文修和申瑞清被带到交河宪兵队。在那里，二人受尽折磨，遭受二十多天拷打，始终不肯屈服。

宪兵队有个李文修的发小，他让人带话给李文修的老娘和妻子，让他们来劝降。周红红说，姥姥见到姥爷时，他已经被打得不成样子。“他们说，哪怕在纸上写下以后不再干革命，也能放回去，但是姥爷不写。”

姥爷摸了摸姥姥的肚子说，“你把家照顾好就行了，这是我个人的信仰，我不会投降的。”

而这，竟成了他们的最后一面。

跟时间赛跑

寻找姥爷李文修的接力棒，最终交到了周红红手上。

从2005年，周红红开始四处寻访。当年，姥爷李文修的一些战友还尚在，但是她始终没有获得确切消息。

偶然一次机会，周红红在档案馆发现一份资料，是当年跟姥爷李文修一同被捕的申瑞清写下的经历。交河宪兵队被关押数日后，申瑞清被押解到了济南新华院，与李文修分别。

据多位战友推断，姥爷大概率是在交河宪兵队就被杀了。“因为他级别比较高，如果不投降，就直接给杀害了。”

周红红说，“妈妈听姥姥提过，姥爷可能被押到济南去了，家里也曾想办法往济南方向寻找。”但在那个年月，车马慢，通信也不方便，要找一个人比登天还难。

李文修当年是否被押到济南新华院？周红红想努力寻找一个答案。

1943年，日军在济南筑起高墙深堑，定名“新华院”，成为日军在山东地区关押、奴役和虐杀抗日军民的核心场所。

从1943年3月至1945年8月，“新华院”先后关押抗日军民和爱国人士约3.5万余人，被酷刑劳役折磨致死1.5万余人，被抽血致死100余人，被注射毒药、细菌致死各数百人，被押送到日本和我国东北充当劳工苦役者1万余人。

数字令人窒息。如今，妈妈已经83岁。周红红说：“妈妈一直有一个心结。人没了，好歹有个结果。到现在，姥爷牺牲在哪里，埋葬在哪里，都不知道。寻访姥爷，不是为了树碑立传。我想圆妈妈的心愿，知道姥爷牺牲在哪里，我们祭奠也有个去处。”

那么，周红红的姥爷是否真的曾被关押在“新华院”？我们将继续关注周红红寻亲进展。

英雄别后无音信 三代亲人苦追寻

河北烈士李文修据传当年曾被关押在济南新华院，烈士后人希望得到相关线索